

【理论探讨】

档案学视域下的数字记忆研究： 历史脉络、研究取向与发展进路

张 斌 李星玥 杨 千

【摘要】信息技术推动了档案记忆研究的发展,数字记忆成为档案学理论研究新的增长点。本文通过梳理档案学视域下数字记忆研究的历史脉络,发现其研究取向具体表现为记忆构建的阐释取向、基于档案管理的资源取向、记忆功用的知识取向和学科发展的融合取向,认为应转变资源取向的研究重点、强化知识取向的深层意义、注重阐释取向的可延展性和理顺融合取向的概念问题。

【关键词】档案学;数字记忆;研究取向

【作者简介】张斌,李星玥,杨千,中国人民大学信息资源管理学院(北京 100872)。

【原文出处】《档案学研究》(京),2023.1.18~24

0 引言

数字记忆作为档案学研究的新领域,完善其相关研究有利于拓宽档案学的研究视野,丰富社会记忆的理论,并推动数字记忆项目建设。近年来,档案学者们积极探讨“数字记忆”概念,对数字记忆的平台建设、资源整合等进行了理论论证和实证研究。^[1]从总体上看,数字记忆的实践热度超前于理论研究。与实践项目相比,针对数字记忆的理论研究仍较为薄弱、零散,方法论与工具层尚未形成通用范式,概念化、系统化理论体系的形成尚需一定时日。因此,文章通过梳理档案学关于数字记忆方面的实践和研究,探讨档案学视域下数字记忆研究的现有取向和发展进路。

1 档案学视域下数字记忆研究的历史脉络

通过文献梳理发现,我国关于数字记忆的研究最早可追溯至20世纪末,档案学者开始关注电子文件,并将其视为一种新记忆。虽然此后陆续有档案学者进行数字记忆的相关论述,但整体较为零散。2010年,冯惠玲在全国档案工作者年会上发表了关于构建“中国记忆”数字资源库的提议和设想,引发了档案学界对数字记忆的关注。此后逐渐形成一些

代表性成果,但总体研究进展缓慢。直至2015年,数字记忆国际论坛召开,档案学界对数字记忆研究的迫切性达成共识。此后,档案学者们从内涵、特点、构建机理等不同角度对数字记忆进行阐述。由此,档案学视域下的数字记忆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萌芽阶段(1997-2009年)、形成阶段(2010-2015年)和发展阶段(2016年至今)。

1.1 萌芽阶段(1997-2009年)

社会记忆理论的蓬勃发展为档案学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开辟了档案记忆新领域,对档案学的理论研究和项目实践产生了深刻的影响。20世纪90年代起,在全世界范围内掀起了大型记忆工程的建设浪潮,由于档案与社会记忆关系密切,我国档案界以独立或合作的形式积极开展了各种记忆项目实践,并逐步形成了系统的“档案记忆观”^[2],也关注到了数字记忆研究。

国内档案学关于数字记忆的研究最早可以追溯到1997年冯惠玲的博士论文《拥有新记忆——电子文件管理研究》^[3],该文虽然并未使用“数字记忆”这一概念,但首次将作为数字档案资源的电子文件与记忆联系在一起,提出以电子文件为载体的新记

忆。这对之后档案学视域下的数字记忆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2008年,《档案馆信息化与档案管理变革:数字记忆之思考》^[4]一书将数字档案馆建设视为数字记忆工程的一部分,聚焦于档案馆面对社会信息化大趋势如何完善档案管理工作。随后,戚颖等学者指出数字记忆是档案记忆观研究的新领域,但其将档案学视域下的数字记忆研究局限于电子文件,并不包括数字信息资源等其他类型。^[5]这些都反映出档案学者们已经意识到信息化为数字记忆研究带来的新机遇,但是对于数字记忆的理解和研究尚处于萌芽阶段,特别是对数字记忆的认知不够全面,存在一定局限性。该阶段数字记忆研究的特点主要表现为开始探寻档案学与数字记忆的关联,重点关注数字记忆视角下的档案资源建设问题,将电子文件和数字化档案资源视为档案学视域下数字记忆建设的重要内容。

1.2 形成阶段(2010—2015年)

2010年,冯惠玲在全国档案工作者年会上倡议全国档案机构共同构建一个基于互联网的、以档案数字资源为主体的数字资源库。此后,冯惠玲又从档案记忆观、资源观的角度出发,撰文论述“中国记忆”大型数字资源库构建的可行性和必要性,并强调档案资源建设的可扩展性和创造性,将目光由档案馆馆藏转向更为广阔的档案资源建设。^[6]杨智勇也从大档案资源观出发,指出信息时代保存的所有信息记录都属于数字档案资源,并强调通过人类自己的智慧进行取舍,利用技术构建记忆。^[7]档案学者们意识到数字资源的重要性,数字记忆研究重点转向更广泛的档案资源。2015年10月,在中国人民大学信息资源管理学院主办的数字记忆国际论坛上,档案学界对数字记忆进行了第一次系统性研讨,初步阐释了数字记忆的概念、背景、动因、特点和目标等。^[8]时任国家档案局局长李明华出席论坛并指出,在大数据时代和“互联网+”的背景下,档案工作者要顺势而为,主动汲取新知识、新方法,改变传统的记忆保存、再现、分享模式,让这个伟大时代的鲜活记忆与数字世界同在同行^[9],加快开展数字记忆研究已经成为档案工作实践的迫切需求。

随着技术的不断发展,档案资源在数量、类型和

形式上都日益丰富,档案外延不断扩大,该阶段数字记忆研究的特点主要表现为研究对象由电子文件扩展到了更为广泛的档案资源,由基于业务的数据库建设转向内容更为丰富的各种数字记忆工程,更加关注数字时代对档案工作的新要求。

1.3 发展阶段(2016年至今)

随着数字档案资源库实践推进以及数字技术进一步发展,数字记忆被赋予更丰富的内涵,档案学者们在该阶段从不同角度论述数字资源建设问题,以更好地构建数字记忆。全国多地相继实施城市记忆工程和乡村记忆工程,我国档案学者和档案工作者积极投身于各种数字记忆工程,档案馆与图书馆、博物馆、文化馆等研究机构共同参与实施了一系列记忆实践项目。如中国人民大学信息资源管理学院积极运用数字人文理论与技术,开展了一系列数字记忆研究项目,包括“北京记忆”“广州记忆”“台州古村落”等。随着《档案记忆观的理论与实践》^[10]的出版,档案学领域关于数字记忆项目的实践有了更明晰的方向,该书对“中国记忆”数字资源库的基本设想、总体框架、技术标准、组织体系与机制建设等进行了详细论述,为档案记忆工程的开展提供指导和参考。《数字时代的城市记忆研究》^[11]一书则是基于我国“数字记忆”工程实践的现状,聚焦数字时代需求,提出城市记忆的理论体系、方法体系和建设方案,深化数字记忆研究和实践。

随着数字资源平台、数字档案馆等实践的深入开展,该阶段数字记忆研究的内容表现为以下特点:第一,关注技术发展给数字记忆带来的种种变化,如探讨媒体融合背景、大数据时代、新媒体以及云环境下的数字档案资源建设,分析数字档案资源管理的思维、原则、伦理、方式、模式、关键要素、问题和策略等。第二,注重国外数字记忆项目实践的案例研究,如以美国飓风数字记忆银行、“9·11”数字档案馆、“佛罗里达记忆”资源库以及东日本“3·11大地震”档案网站等为例探讨如何借鉴成果经验,通过数字档案馆资源建设实现对数字记忆的构建。第三,关注档案内容,对档案管理更加颗粒化,重视资源的开发利用。如关注非结构化数字记忆资源的资源整合、数据挖掘、知识发现、知识关联和知识服务等。第

四,研究对象由机构的数字记忆保存深入个人,关注个人数字记忆存档对象等问题^[12],探讨大数据环境下个人数字记忆的现状和前景,提出个人数字记忆库建设对策^[13]。第五,关注互联网原生信息,呼吁档案学界把握“互联网+”背景下向互联网原生数字信息领域开拓的契机,以社交媒体为切入点积极参与国家数字记忆的构建^[14],探讨面向数字记忆保存的网络信息存档现状、存在问题以及未来可探索的发展方向等^[15]。第六,关注档案学与数字人文领域的合作。数字人文实现了数字技术与人文研究之间的动态对话,对档案学深化数字记忆研究具有积极借鉴和指导意义,文件档案管理领域与数字人文跨界融合,打造出全新的学科研究领域——数字记忆。^[16]学者们基于数字人文和数字记忆的共同点,利用数字人文理念和数字方法为数字记忆的理论与实践研究提供参考和借鉴。

2 档案学视域下数字记忆的研究取向

回顾档案学视域下数字记忆研究的发展脉络可知,相关研究正逐步由关注数字记忆项目实践转向数字记忆理论研究,档案学不仅为数字记忆构建提供指导和服务,而且随着研究的深入,在数字记忆研究过程中与其他学科相互融合吸收,得到了进一步的丰富和发展。在档案学实践方面,主要通过对档案资源的保存、管理、利用的流程、工具、方式、模型和方法等方面的研究,实现数字记忆构建与共享传播,表现出明显的资源取向和知识取向。在档案学理论方面,具体表现为以档案学为出发点,探析数字记忆的概念、要素、本质、内涵、外延、特点和建构机理等,体现了人文研究的特性,表现出一定的阐释取向。在档案学技术方面,档案学视域下的数字记忆研究与网络技术、数字人文等紧密相连,通过数字记忆研究揭示了档案学在其他学科领域的发展前景,进一步解释了档案学科自身,表现出学科融合取向。值得注意的是,四个取向之间并非独立存在,而是相互关联的,只不过侧重不同。

2.1 基于档案管理的资源取向

档案学视域下数字记忆研究的资源取向主要从数字记忆基础设施的资源建设的视角出发,强调档案信息资源是构建数字记忆不可替代的重要资源,

需要对其进行保存与开发,开展面向数字记忆的档案资源建设研究。通过探讨分析档案资源在数字记忆构建过程中的保存、组织、再现与传承等方面的理论、方法、技术、标准及其应用,加强对数字记忆档案资源的管理和利用,以发挥档案在数字记忆研究中的价值和功用。随着记忆工程的深入开展,我国档案学者对数字记忆有了更深入的认识,拓展了“档案记忆观”的理论边界,研究对象由最初的“电子文件”发展到“档案资源”再到“数字资源”构成的数字记忆,数字记忆内涵不断丰富发展,为档案机构在数字时代保存、传承和建构记忆提供了新的方法和手段。在数字记忆研究历程中始终关注档案资源建设问题,提出构建面向记忆的数字档案资源库,并从构想、内容、原则、理念、路径、架构、机制和框架^[17]等方面进行探讨。

记忆早期被视为被动的储藏室,“记”和“忆”在档案学领域对应着档案信息资源管理的“存储”和“提取”两个环节,数字记忆研究的资源取向具体体现为研究关注档案信息资源保存和检索的技术、方式和方法等方面。在“存储”环节,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传统档案资源数字化处理和网络信息资源归档两方面。其一,数字档案资源建设是数字时代维护整体社会记忆的重要基础,关于传统档案资源的数字化处理研究主要探讨如何对档案资源进行数字化整合,为数字记忆构建提供资源支撑。学者们积极探索异构数据资源整合^[18]、数字档案资源库建设路径模式^[19]等,为档案资源参与数字记忆构建提出设想。其二,技术的快速发展使人类社会拓展到网络空间,学者们认识到网络信息为人类留存与构建数字记忆提供了新的可能性,因而将网络信息视作数字记忆资源建设的重要资源,探析数字记忆资源的建设需求导向下信息捕获与整合问题,网络信息存档研究成为焦点。^[20]在档案信息资源检索环节,则注重数据库信息资源的整合,为用户提供资源检索和调用的多种途径。然而随着技术的发展和用户需求的变化,档案学者们发现仅仅处于资源存取层面的数字记忆工程不能提取关联内容,难以实现基于内容的深层知识发现,无法实现档案价值最大化。因此,数字记忆研究对资源存取的重点逐渐转到如

何采用现代数字技术实现对档案内容层面的知识管理和深层次开发利用。

2.2 记忆功用的知识取向

数字记忆资源建设研究的知识取向具体表现为理念上关注知识组织、发现与创造,技术上关注知识抽取、知识图谱和知识检索等,最终目的是对数字资源进行系统化建设形成数据库。知识取向的研究内容主要包括通过获取与存储档案信息资源建设数据库、数据集,发挥记忆的记录功能,对历史和社会等进行描述,以及通过对海量档案信息资源进行数据挖掘,从中发现有趣的模式和知识,为用户提供有价值的信息和知识。

随着记忆研究的深入,记忆功能被分为“预设功用”与“附带功用”两种,“预设功用”即决定产品用途的基本性能。^[21]记忆系统本身的“预设功用”是通过以往知识经验的总结来解决现在和未来的问题等,“存储”和“提取”则可被视为记忆的“附带功用”。档案学视域下数字记忆的资源建设研究也相应地呈现出变化趋势:不仅注重资源管理的细粒度,由资源存取深入内容管理,由信息层面管理深入数据管理;同时注重资源的开发利用,研究重点由“附带功用”向“预设功用”转变,从内容载体向内容开发扩展,强调档案信息资源的知识管理。^[22]

数字记忆领域中的档案资源研究由对海量的纸质档案、在线数据以及纷繁复杂的其他史料等记忆资源进行规模化处理,开始转向基于内容的档案数据资源管理。研究开始关注档案内容的知识重组和知识增值^[23],试图通过对数字档案资源进行知识管理,活化档案,以提升检索效率,为用户提供知识服务。其实质是以数字记忆理论为指导或面向数字记忆的档案知识管理,主要是基于数字记忆资源生命周期或参照构建数字记忆的流程对记忆属性的档案资源进行数字化保存,利用数字仓储系统,实现资源整合、数据挖掘、知识发现和知识关联等,并以可视化技术再现,提供面向知识内容的服务,为用户决策提供资源选择依据。如通过深入挖掘档案内容数据,发现数字档案资源之间的隐含关系,建立由点到线、连线成面的联系,揭示复杂的语义关系,实现基于实体关联的档案资源知识化开发^[24]等。档案学视

域下的数字记忆研究基于知识组织理论、技术和工具的发展,借助于自然语言处理、文本识别、信息抽取、本体技术等方法,通过对数字化记录资源的内容层次和知识组织等将内部结构加以有效表征,建立资源与知识之间的广泛关联,形成可被机器理解和计算的语义互操作。

2.3 记忆构建的阐释取向

档案学视域下的数字记忆研究正在从以数字记忆项目为中心、以数字档案资源建设为重点的“档案资源型”转向以基础理论、发展导向等为主的“理论阐释型”,由早期“重视档案资源建设”的工程思维转变为“档案数据如何构建数字记忆”的科学思维,体现了档案学在数字记忆研究方面的文化阐释取向。数字记忆研究的阐释取向将数字记忆看作一个动态的、有目的的、“追寻意义”的重建过程,赋予其更加积极的内容,主要研究内容为从数字档案到数字记忆的建构理路,如分析档案作为数字记忆的构建要素如何实现价值和发挥作用等。目前档案学界关于档案是“记忆载体”“记忆工具”“冻结的社会记忆”“固化的记忆”等认知达成了一定共识,档案将记忆信息储存起来备用,以留传后人,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随着研究的深入,档案学界逐渐认识到档案是建构的重要资源,档案管理本身也是在建构“过去”。云存储、大数据等智能技术提高了档案管理的效率,为档案记忆的构建提供了更多可能性。技术的无限赋能带来了巨大的数字红利,然而过度推崇与依赖数字技术会使我们失去对过去的思考与重构^[25],档案学视域下的数字记忆研究显然也意识到了这一点。

数字记忆研究的阐释取向表现在不再仅仅将档案作为构建数字记忆的重要资源,而是更多思考档案在数字记忆构建过程中各个阶段的角色变化和功能作用。学者们从档案资源或档案管理方式上对数字记忆及其构建理论进行论述,日益重视档案参与数字记忆构建的理论阐释,研究重点由数字记忆项目实践转向数字记忆理论研究。后者既包括关于档案在数字记忆构建中的功能和定位问题研究,也有针对档案建构数字记忆理路的探究。前者如从电子文件视角出发,认为档案领域研究的数字记忆应该

是以电子文件为载体的数字记忆;从档案构建数字记忆的流程出发,认为数字记忆是“将特定对象的历史文化信息以数字方式采集、组织、存储和展示,在网络空间承载、再现和传播的记忆形态”^[26];从广义档案信息资源视角出发,将由个体所存储的一切数字项目组成的集合称为人类数据化记忆(Human Digital Memory, HDM)^[27]。后者例如通过“台州古村落”数字记忆平台分析数字记忆构建的新模式,通过数字档案网站、数字记忆库探索网络时代数字记忆的社会共建模式等。随着数字记忆研究的深入开展,逐渐形成了面向数字遗产、数字知识、数字人文三个视角的数字记忆建构观。^[28]档案学对于数字记忆内涵的阐释越发深入与全面,由传统的电子文件扩展到数字信息,由静态的记忆构成深入记忆的动态流动。

2.4 学科发展的融合取向

档案学视域下的数字记忆研究推动了档案学与其他学科的相互促进和相互发展。其离不开档案学基础理论的指导,数字记忆构建需要对图像、视频、音频、网页等日益丰富的档案资源通过文本挖掘、关联数据、历史地理信息化等技术进行整合管理和开发利用,档案学为其他学科使用档案构建数字记忆提供了知识、理论、技术等支持。与此同时,作为数字记忆的内容及其载体,档案参与建构的过程也体现了档案在数字时代的新变化和档案学在数字时代的新发展。档案学在研究数字记忆的过程中参考借鉴了社会学、历史学、文化学和心理学等其他学科的知识,不仅拓展和丰富了档案记忆观,也推动了自身的丰富和发展,表现出了学科知识、技术和方法等方面的融合取向。

随着新文科建设和人文学科知识体系及研究方法的发展,历史学、社会学、文化学、艺术学等为档案学领域开展数字记忆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思维方式、研究方法和技术工具,创新了档案记忆构建的思路,改变了档案对数字记忆的组织、构建与再现的方式,提供了适用于数字记忆共享、传播规律研究的可计算研究方法。^[29]一方面,档案学在参与数字记忆构建过程中,强化了与其他学科的交叉融合,参考借鉴和吸纳融合了其他学科的技术和理论。如数字人

文为档案学研究数字记忆提供了理论和实践支持,其数字方法有利于推动档案学视域下数字记忆理论构建和方法论研究,促进叙事的数字化转型,通过故事数据化、数据故事化等方法提升数字记忆研究的科学性、规范性和功能度。^[30]与此同时,档案学通过开展数字记忆研究实现了自身的拓展,如数字记忆构建中档案的数据化改变和扩展了档案学传统的档案管理流程、结构、方法、程序与理论,以非线性取代线性、以可回溯性取代单向性、以功能至上取代机构至上……^[31]数字记忆研究的开展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档案学的传统习惯和既有规范,关于数字记忆的档案实践不断取得突破式创新。

3 档案学视域下数字记忆研究的发展进阶

受到后现代主义社会思潮、数字技术的迅猛发展、档案实践需求的变化、新文科建设的时代背景等各种主客观因素影响,档案学视域下数字记忆研究日益深入,表现出基于档案管理的资源取向、记忆功用的知识取向、记忆构建的阐释取向和学科发展的融合取向。针对这些研究取向提出数字记忆研究还需要通过转变资源取向的研究重点、强化知识取向的深层意义、关注阐述取向的可延展性、理顺融合取向的概念问题等,推动档案学视域下数字记忆研究的深入开展。

3.1 转变资源取向的研究重点

档案始终是档案学研究的主要对象,这导致档案学视域下的数字记忆研究在早期就表现出了明显的资源取向,并受档案信息资源的变化影响。随着计算机与互联网技术的发展,数字资源逐渐成为社会主流的信息资源,记忆不可避免地进入数字世界,人类开始迎来“过于丰富与完善”的记忆。一方面,我国积极推动数字档案馆建设,数字档案资源在数量上呈指数型增长。另一方面,大量原生数字资源的生成正改变数字时代的记忆构成,特别是互联网的原生数字信息正在广泛记录人类世界,原生网络信息如何通过档案化管理服务于数字记忆构建成为日益紧迫的议题。^[32]

综上所述,资源取向的相关研究已经相对成熟和系统化,并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目前应当将关注的重点转向原生数字档案的记忆生态问题,深入

思考大量原生数字档案对构建数字记忆的影响。技术的发展使数字记忆的形成和消逝呈现出新的面貌,数字记忆的静态存储与动态流变成为可能,档案数据存储的内容、方式、运作机理以及人们对待这些数据的方式都将影响人类的记忆。^[33]资源取向的建设重点已经呈现出由传统媒介档案的数字化到原生数字档案资源再到网络信息资源归档的变化趋势,个人数字记忆与网络数字记忆成为档案学数字记忆研究资源取向的新焦点,如何实现各种数字资源的整合,从而构建完整的数字记忆将成为未来资源取向的研究重点之一。

3.2 强化知识取向的深层意义

伴随信息技术的发展,档案数据化成为档案学数字化发展的新阶段,管理目标发展为将数字档案资源转换为可供阅读、分析和处理的档案数据资源,加快推动基于档案内容的智慧化管理。^[34]各种档案信息资源通过知识图谱、实体识别、机器学习、数据可视化等技术实现了知识挖掘、时空计算、社会关系分析等^[35],为面向数字记忆的档案知识管理提供了新的技术、方法和视角。

随着研究的深入,研究焦点已由记忆的存储功能转向了知识管理,然而研究视野依然指向过去,注重总结过往知识经验,而较少关心未来。心理学研究证实,人类回溯过去的的能力可能只是为了更好地建构未来。^[36]因此,数字记忆研究的知识取向应当关注了解过去是如何创造未来的,如此才能为现在如何创造未来提供知识参考。这就要求档案管理不仅要注重内容的数据化,还要注重数字时代档案是如何保存以及所选择的方式对数字记忆构建所造成的影响。此外,在技术方面,面向数字记忆的知识管理虽然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档案信息资源的细颗粒组织、深度价值挖掘与可视化知识服务,但在知识图谱的推理功能、细粒度的知识问答等方面有待深化研究。

3.3 注重阐释取向的可延展性

档案学视域下的数字记忆构建研究相对注重具体项目实践和档案资源建设,需要进一步强化数字记忆的文化阐释,深化档案学关于数字记忆研究的理论阐述。阐释取向要求不仅关注数字记忆构建的

技术,还要关注现实意义,并将数字记忆视为一个动态的过程,考察各要素之间的关系,从文化意义和整体结构两方面拓展阐释的维度。

在文化意义方面,记忆不仅涉及话语、符号、象征和叙述,也涉及更为深层的人们对世界的理解,即韦伯意义上的“理解”和涂尔干意义上的“民情”与集体意识,核心都是人们对历史变迁过程的理解和阐释。^[37]阿斯曼的“文化记忆”理论、诺拉提出的“记忆之场”以及哈布瓦赫关于集体记忆的探讨都涉及人们对“意义”的理解以及围绕意义的产生、表达、接受和再生产过程的研究。越来越多的学者认识到记忆由当下的社会框架塑造,并被人们不断更新和覆写,这就导致记忆研究与自然科学重点关注“是什么”有所不同,需要更加关注“为什么”。数字时代的记忆构建受到社交媒体等因素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冲击了集体记忆对个人记忆的控制,淡化了交往记忆和文化记忆的界限,值得档案学者进一步深思。档案学者要关注数字记忆构建的深层含义和数字档案文献背后的意义,探寻如何通过档案资源实现数字记忆的构建、阐释和传递的现时化以及对意义的传承。此外,在整体结构方面,阐释取向要求重点关注人们使用档案建构数字记忆的动态过程,以及分析档案在该过程中扮演的角色,需要对主体、客体、动因和结果等因素采取关联式的考察,而目前研究主要集中在客体要素,也就是档案资源。数字记忆研究需要强化整体结构下的动态分析,考虑档案与其他因素的关系、其他因素对数字记忆构建的影响等,思考社交媒体影响下社会框架对数字记忆影响的减弱、数字记忆构建主体及其主观意愿的变化、集体记忆和个体记忆之间的关系等问题。^[38]

3.4 理顺融合取向的概念问题

记忆作为一个跨学科研究领域,历史学、文化学、社会学、民俗学、艺术学和哲学等都对其从不同层面和视角进行了各自学科的探索,“记忆”这个词汇变得越发无处不在,这导致我们在谈论数字记忆的时候,越发具有不确定性。学者们从不同角度对数字记忆进行了多样化的解读,但由于对数字记忆概念的理解来自不同视角,导致数字记忆认知窄化、

理解碎化甚至产生误读。数字记忆研究存在泛化与窄化的问题。泛化体现在对“记忆”含义认知的宽泛性,特别是随着互联网、信息存储和检索技术等快速发展,信息生产机制陷入了只“记录”不“记忆”的困境,具体表现为将所有数字信息保存均视为记忆议题加以讨论,并未形成数字记忆的专门学术领域。如从广义出发,将用数字代码记录的人类活动信息都当做数字记忆,包括微博、微信网页信息,现场拍摄的照片、视频等。窄化体现为将记忆简单理解为记录,忽略两者之间的差异,即记忆的内化性与记录的外在性。当记忆被窄化,被理解为记录,文化再生产也就简化为知识的存续和累加。^[39]目前学者们对于数字记忆概念的认知角度不同,将其视为数字时代的记忆、数字化的社会记忆或数字记忆项目实践等,实质多为面向数字记忆的档案资源管理。梳理数字记忆的形态和基本属性,从对象、活动、知识和情感等多维度揭示数字记忆,在此基础上整合其本质呈现的特征,将其从不同维度视为一个整体,才能推动数字记忆研究开展。档案学在数字记忆研究中体现出了学科融合的趋势、彰显了数字人文理念,但也带来了诸如档案概念泛化、数字记忆概念不确定等问题,如何在保持档案学学科优势的前提下,从跨学科视角研究数字记忆成为重点。

4 结语

现代信息技术为档案学视域下的数字记忆研究提供了新技术路径,为档案学与其他学科的交叉研究提供了新的可能性,档案学在该研究领域大有可为,应当利用自身特色与优势,把握机遇,深化数字记忆的理论 and 实践研究,在数字记忆研究领域打造自身学科话语。

参考文献:

- [1]冯惠玲,连志英,曲春梅,等.回顾与前瞻:“十三五”档案学科发展调查和“十四五”档案学重点研究领域展望[J].档案学通讯,2021(1):4-15.
- [2]丁华东.档案记忆观的兴起及其理论影响[J].档案管理,2009(1):16-20.
- [3]冯惠玲.拥有新记忆——电子文件管理研究[D].北京:中国人民大学,1997:15.

- [4]薛四新.档案馆信息化与档案管理变革:数字记忆之思考[M].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8.
- [5]戚颖,倪代川.数字记忆:档案记忆观研究的新领域[J].山西档案,2010(3):14-16.
- [6]冯惠玲.档案记忆观、资源观与“中国记忆”数字资源建设[J].档案学通讯,2012(3):4-8.
- [7]杨智勇.由原始记忆走向智慧记忆——论档案记忆功能的历史演变及其未来趋势[J].档案学通讯,2014(5):14-17.
- [8]冯惠玲.数字时代的记忆风景[N].中国档案报,2015-11-19(3).
- [9]张雪威.数字记忆,传承文明[J].北京档案,2015(11):1.
- [10]徐拥军.档案记忆观的理论与实践[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
- [11]牛力.数字时代的城市记忆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0.
- [12]王新才,徐欣欣.国外档案学视阈下的个人数字存档对象及其对应中文词探析[J].档案学通讯,2016(5):33-39.
- [13]谢笑,王文韬,谢阳群.基于个人信息管理的全面数字记忆探析[J].图书馆,2017(1):17-23.
- [14]周文泓.我国网络空间中档案领域的缺位审视和参与展望——基于社交媒体信息保管行动的解析[J].档案与建设,2019(9):13-17.
- [15][32]周文泓,代林序,杨梓钊,等.基于数字记忆保存的网络信息存档实践进展研究及启示[J].情报理论与实践,2020(7):37-42,36.
- [16]加小双.档案学与数字人文:档案观的脱节与共生[J].图书馆论坛,2019(5):10-16.
- [17]赵生辉,朱学芳.数字社会记忆资源跨机构聚合机制研究[J].档案学研究,2014(2):34-38.
- [18]牛力,赵迪,韩小汀.“数字记忆”背景下异构数据资源整合研究探析[J].档案学研究,2018(6):52-58.
- [19]谭必勇,陈艳.社会记忆视野下数字档案资源建设的多元化路径探析[J].档案学通讯,2018(1):62-66.
- [20]周文泓,苏依纹,代林序,等.进展与展望:面向数字记忆资源建设的网络信息存档[J].图书馆论坛,2020(9):42-52.
- [21]李荆广,郭秀艳.记忆研究的功能取向[J].心理科学进展,2009(5):923-930.
- [22]牛力,刘慧琳,曾静怡,等.数字时代档案资源开发利用的重新审视[J].档案学研究,2019(5):67-71.
- [23]吕瑞花,覃兆别.基于“活化”理论的科技名人档案开发研究[J].档案学研究,2015(4):4-7.
- [24]牛力,曾静怡,刘丁君.数字记忆视角下档案创新开发利用“PDU”模型探析[J].档案学通讯,2019(1):65-72.

- [25][英]维克托·迈尔-舍恩伯格.删除:大数据取舍之道[M].袁杰,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3:231.
- [26]冯惠玲.数字记忆:文化记忆的数字宫殿[J].中国图书馆学报,2020(3):4-16.
- [27]Liadh Kelly, Gareth J F Jones. Venturing into the labyrinth: the information retrieval challenge of human digital memories[C]//In Workshop on Supporting Human Memory with Interactive Systems, Lancaster, UK, 2007: 37-40.
- [28]周耀林,刘晗.数字记忆建构:缘起、理论与方法[J].山东社会科学,2020(8):50-59.
- [29]郑爽,丁华东.数字人文对档案记忆功能实现的启示[J].档案与建设,2019(7):23-26.
- [30]冯惠玲.数字人文视角下的数字记忆——兼议数字记忆的方法特点[J].数字人文研究,2021(1):87-95.
- [31]闫静,徐拥军.后现代档案学理论的思想实质研究[J].

档案学研究,2019(4):4-12.

- [33]闫宏秀.记忆何以创构未来——数据与记忆的未来指向[J].探索与争鸣,2018(11):67-72,117.
- [34]赵跃.大数据时代档案数据化的前景展望:意义与困境[J].档案学研究,2019(5):52-60.
- [35]王丽华,刘炜.助力与借力:数字人文与新文科建设[J].社会科学文摘,2022(2):15-17.
- [36]刘岩,杨丽珠,徐国庆.预见:情景记忆的未来投射与重构[J].心理科学进展,2010(9):1403-1412.
- [37]钱力成.记忆研究的未来:文化和历史社会学的联结[J].南京社会科学,2020(3):137-142.
- [38]夏翠娟.构建数智时代社会记忆的多重证据参照体系:理论与实践探索[J].中国图书馆学报,2022(5):86-102.
- [39]胡百精.互联网与集体记忆构建[J].中国高校社会科学,2014(3):98-106,159.

Digital Memory Research in Archival Perspective: Historical Lineage, Research Orientation and Development Path

Zhang Bin Li Xingyue Yang Qian

Abstract: The development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has promoted archival memory research, and digital memory has become a new growth point for archival theoretical research. By combing the historical lineage of archives' participation in digital memory research, it is found that the research orientation of digital memory in the archival perspective is specifically manifested in the interpretive orientation of memory construction, the resource orientation based on archival management, the knowledge orientation of memory function, and the fusion orientation of disciplinary development. It is necessary to shift the research focus of the resource orientation, strengthen the deeper meaning of the knowledge orientation, focus on the extensibility of the interpretation orientation, and rationalize the conceptual issues of the integration orientation.

Key words: Archival science; Digital memory; Research orientation